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6.011

空间意识下的启蒙新变：再读《孔乙己》

常琳

(湖南农业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鲁迅小说《孔乙己》，篇幅短小，却张力宏大。其在五四运动高亢激昂的时代背景下，以简单而朴实的生活叙述还原了社会原场，推进了鲁迅有关启蒙的理性思考。小说中“抽象”与“差异”的社会空间并置，“道”与“势”的文化冲突共存，凸显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思想启蒙的清醒认知。《孔乙己》冷静的叙述笔调是鲁迅启蒙批判理性的文本外现，而其小说创作从狂热走向理性，彰显的正是启蒙批判理性思想的发展新变。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空间意识；批判理性；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4)06-0084-08

New Changes of Enlightenment Under Spatial Consciousness: Rereading *Kong Yiji*

CHANG Lin

(General Education Centr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Lu Xun's novel *Kong Yiji* is short in length but grand in ten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high-spirited May Fourth Movement, his simple and unadorned narration of life restores the original social scene and advances Lu Xun's rational thinking on Enlightenment. The juxtaposition of "abstraction" and "difference" in the novel and the coexistence of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Dao" and "Shi" highlight Lu Xun's sober awareness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 calm narrative style of *Kong Yiji* is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Lu Xun's enlightenment critical rationality, and his novel creation has shifted from fanaticism to rationality,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new changes of enlightenment critical rationality.

Keywords: Lu Xun; *Kong Yiji*; spatial consciousness; critical rationality;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在《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一文中，鲁迅学生孙伏园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1]。《孔乙己》一文虽篇

幅短小，却包蕴巨大的张力，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过解读和阐释。已有研究多围绕两重话语体系展开：一是空间结构话语模式。如，从小说叙事结构角度切入，提出《孔乙己》是空间

收稿日期：2024-05-1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湖南乡土小说伦理叙事研究”（XSP21YBC414）；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南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研究”（22C0096）

作者简介：常琳，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形式小说的一次成功尝试，在中国小说创作上具有开创性的巨大意义^[2]。二是身份解读话语模式。如，从主人公孔乙己身份视角切入，认为小说借孔乙己之死鞭挞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进而终结了鲁迅内心深藏多年的怨父憎父情结，完成了其小说创作笔调由阴郁激愤而为明丽温婉的华丽转身^[3]。又如，肯定孔乙己作为读书人（对于将孔乙己视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笔者表示疑问）的身份坚守、话语体系坚守和人格品行坚守，认为无论生活处境如何，孔乙己能始终自守读书人的简单与执着，其当为当下“看主人眼色而狂吠”或“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的读书人借鉴^[4]。再如，认为小说基于“鲁迅自身的痛切体验与积年的观察，思索所支撑”的故事，揭示了“科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5]。以往研究代表了鲁迅研究阶段性趋势和时代性特色，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些研究也有主观臆想和过度阐释的嫌疑。将创作于1918年的《孔乙己》放置于五四时期这一鲁迅创作理念由激情趋于理性的发展阶段来看，不难发现，鲁迅借文本空间形式叙事反映的正是作为“个体”人的“群体”归类和社会阶层的显性划分，其表达了鲁迅对中国社会启蒙现状的清醒认知和对启蒙困境的深刻剖析。《孔乙己》被认为“写得从容不迫”^[6]；这种“从容不迫”是对鲁迅理性审视社会、清醒认知现状的高度肯定。对此，鲁迅在文后“附记”中平静而简单地进行了补充阐述：“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7]563}鲁迅视《孔乙己》为“一篇很拙的小说”^{[7]563}，折射出他在理性认知背后的焦虑和隐忧。这里的“拙”，指的是鲁迅虽自身清醒认清现实却又徒劳无力的“空洞”与“无物”感受。可以说，《孔乙己》开启了鲁迅五四之后启蒙思想的发展新变。

一、“抽象”与“差异”：独立个体与多元群体并置的空间意义

《孔乙己》的开头，就构建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空间结构。“鲁镇的酒店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7]559}其奠定了故事发生场景的空间意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

喝。”^{[7]559}“曲尺形的大柜台”和“店面隔壁的房子”共同构建出文本故事的位置坐标。“房里”和“房外（柜台）”是故事人物活动的两大物理空间，而一张曲尺形的柜台又将“房外”分隔成两重物理空间。至此，“房里”“柜台内”“柜台外”构建出作品的三重空间。人类在物理空间中发生的语言和行为形成其社会空间，“从根本上说，社会空间是以种群方式生存的人类的自然属性”^[8]。因此，不同种群的分布赋予了特定活动空间和生存领域象征的意义，而空间的大小与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与此间活动的种群属性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三个物理空间，不仅体现（分隔）了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不同空间范围内不同活动群体折射出的思想意义。三个物理空间，因其与孔乙己行为逻辑和话语表达的相关性，获得了三个独立空间活动群体的身份特征，并因此获得故事本身及衍生的思想特征。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7]559}“做工的人”这一社会群体是柜台外的人物主体。“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7]560}小伙计成为与柜台外做工的人相对的柜内空间主体。“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7]559}“穿长衫的”则是“房里”的空间主体。在如此身份鲜明的群体划分中，孔乙己成了一个另类，“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穿长衫”的外在形象和背后代表的身份，本应将孔乙己置身于“房里”但却不能的原因在于其贫穷。经济地位成为物理空间划分的一个关键原因。鲁迅不嫌烦琐地在文中用金钱数量来为其做佐证。“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7]559}“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7]559}“只有穿长衫的”，才愿意花上十几文甚至几十文，“要酒要菜”，经济地位成为故事空间划分的显性依据。空间的划分实际是权力优劣的直接呈现，空间关系的不平等直接源于权力分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差异化的空间背后，

实质就是福柯所说“权力”因素。权力优劣实为《孔乙己》文本故事空间划分的隐形标尺。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7]560}“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7]561}是故事赋予孔乙己的身份特征,而取笑孔乙己是掌柜赋予“我”的特殊权力,取笑、嘲讽并将其作为谈资则是掌柜和坐在店内喝酒的酒客的乐趣和生机所在。如此,孔乙己就只能在长衫主顾的“话语空间”、掌柜的“权力空间”以及小伙计的虽“对等却不平等空间”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了。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界定了一种社会空间,即“抽象空间”。他认为,“现代”是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重要表征,“抽象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擦除区分”。如此,差异化的“现代”存在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人的差异性存在受到否定,“人”和“文学”都将失去其应有的立体化和丰富性而走向扁平。列斐伏尔在批判资本主义“扁平化”“抽象空间”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理想的空间,即“差异空间”。其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存在。正是由于差异化的个体存在构成了人的世界和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在“差异空间”中展示个体的差异与群体的合力,《孔乙己》如此,《祝福》如此,《阿Q正传》也是如此,它们构成了鲁迅小说叙事的一种话语模式。

小说《祝福》中,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乡绅阶层,以其高人一等的身份优势和因掌握地方话语权而树立的威信,对社会底层的祥林嫂颐指气使:禁止她参与年关祭祀的各项活动,只因为她丧夫的晦气经历;称其为“谬种”,指责其“破坏风俗”,只因为她身为寡妇却再嫁。四婶更是以实用主义价值标准看待和衡量同为女性的祥林嫂。“试工期间,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9]649}勤劳能干且强壮有力,在体能上与男子相媲美,四婶眼中的祥林嫂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超强体能的机器,以至于祥林嫂被婆婆绑走后其依然惦记着她的勤劳和能干,而非她命运的不幸与悲惨。当祥林嫂再次回到鲁家时,四婶却对其充满不满与抱怨,缘由是其手脚不如以前

利索,体力也不如以前充沛了。显然,同为女性,四婶从未以同性的视角平等地打量过祥林嫂的身世和遭遇,这一方面是出于认知的局限。四婶虽居于乡绅家庭却实为庸众的身份地位,使其难以拥有更高的格局和更阔的情怀去同情祥林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四婶与祥林嫂不同的生存空间与身份地位将两者划分到完全“差异”的话语权力空间中。如此,四婶便用俯视的眼光审视着祥林嫂的一切。如果说四婶是凭借四叔(鲁四老爷)乡绅阶层的身份优势得以如此,那么,同为仆人身份的柳妈对祥林嫂遭遇的各种好奇和恐吓就更让我们见识到了不同群体之间空间的“差异”和隔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9]657}柳妈是鲁镇女人中的一个代表,她用置身事中的好奇和置身事外的打探,居高临下地旁观着祥林嫂的一切。论社会地位,论经济状态,她们并不优于祥林嫂,同样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然而,她们却以抱团的形式将“个体”的祥林嫂隔离出去。在对“抽象空间”的想象中,“差异空间”却以其独立与隔离彰显了相异的地位和权力,且互相否定。《阿Q正传》中的“阿Q”,在“未庄”这个由多重“群体”组成的社会空间中,既受到以赵老太爷为代表的“乡绅阶层”的排斥,也受到以王胡和小D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的排挤,就连向来以慈善为旨的老尼姑也对其行径给予谴责。个体“阿Q”尝试用各种方式融入群体,却招致如同“孔乙己”遭受酒客嘲笑般的讥讽。

其实,“未庄”是“鲁镇”,是“故乡”,也是“咸亨酒店”,这些场所都是中国社会空间设置的一个缩影;而孔乙己同时也是“祥林嫂”“阿Q”或“我”,这些人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自己所置身的群体场域中。结果,孔乙己“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阿Q“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祥林嫂“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其所共有的置身“差异”空间的结局形成了文本叙述共有的隐喻:在“差异”空间的多重设置中,彰显了文化的多元,也隐射着在以权力话语为隔离标准的多重文化空间中,个体与群体之间难以融合的距离与隔阂。这是鲁迅之惑,也是启蒙之难。

二、“道”与“势”：话语权威与个体消亡的文化意义

孔乙己的空间位置隐射其身份定位，而其身份定位成为理解故事文本和延伸空间内涵的解读关键。“穿长衫”是孔乙己自我设定的身份标志。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7]560}“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7]561}他人的对话间接确立了孔乙己的阶级所属。生活窘迫，“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7]561}；处境卑微，却从不放弃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其所谓“君子固穷”“者乎”“窃书不能算偷”等；地位低下，却坚守文人的传道身份，如其所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7]561}“中国人虽然否定个体，却重视自我。”^[10]不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孔乙己始终以读书人的身份地位定位自己，尽管他没能通过科举考试享受国家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也没能作为士绅阶层以“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11]2}，更没有进入幕府充当幕僚。因此，他与丁举人构成封建社会科举仕途杠杆的两端。以儒家价值体系为其意识形态所属的士大夫阶层，依附社会主流政治环境生存，科举考试是其进阶之途，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辅佐君主为其理想生存轨迹。因其所遵从的儒家思想价值体系是宗法制家族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意识，亦为当时朝廷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其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稳定且稳固。同时，士大夫阶层一旦进入仕途，既辅佐君主实施政治统治，又置身民间进行思想教化和道德表率，生存地位高等且优越。正如梁漱溟所言，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12]的社会组成中，“士”排序第一的职业分工，显现出突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优势。孔乙己虽以“士”自居，却无“士”权力之实。

“文化是一种霸权，因为它充满了生命的整个过程——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活动，也不仅是明显的社会活动，而是整个生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实质所在。”^{[11]42}在下层民众看来，处于官与民中间的士大夫阶层，因为附庸于社会主体意识形态，掌握话语霸权，可以通过认同和控制关键的社会行为来巩固其地位，并使其权威不显自明。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7]562}他者的言说，透露出丁举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不言而喻的话语权威，彰显出坚固而稳定的文化霸气。由身份而论，丁举人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乡绅”。何谓“乡绅”？指的是“乡里中的官吏或读书人”^[13]。乡绅阶层既经济殷实，又享有政治特权。一方面，这一阶层在所属的地域拥有大片土地，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这一阶层经历了科举制度的选拔，拥有和官僚权力阶层相通的地方势力，掌握着一定的地域话语权。明清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分别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科举考试实行晋级制，也就是只有通过第一级考试才有资格参加第二级考试，通过了第二级考试才有资格参加第三级考试。以“举人”为例，参加第一级考试在童试中取中者即可当上“秀才”，获得“秀才”资格后参加乡试考中者方为“举人”。当孔乙己被酒客问及“孔乙己，你真认识字么？”“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7]561}时，酒客立马追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7]561}对于孔乙己科举考试第一级都没过的事实追问，“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7]561}。一方面，孔乙己身为读书人对于自己科举失败的在意和羞愧，再次佐证了其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另一方面，“秀才”和“举人”两重身份的差别，更凸显出“丁举人”在酒客们心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反证了孔乙己的弱势和卑微。在鲁迅的作品中，丁举人和《离婚》中的七大爷、《长明灯》中的四爷身份一致，均居于科举杠杆的另一端，彰显出乡绅阶层的话语权威和文化霸权。七大人并没有否定爱姑的控诉，他通过“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的“屁塞”这一毫无意义的文化象征消解了这场离婚冲突。七大爷的身份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话语权威，“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立于七大人面前的垂手挺腰、毕恭毕敬就是对权威的一种无声服从，而“屁塞”这一文化虚饰树立起了七大人这一话语权威更强大的影响力。《长明灯》中的四爷，也是一位介于官与民之间的乡绅。他主导着民间的话语权，是当地话语权威的代言人，以其自立身份和标榜权威独树乡绅文化空间。判决疯子的去与留，自然成为四爷的权力所在，而四爷的客厅也就自然成为该权力执行和实施的场所空间。

孔乙己“知识分子”之名却非“知识分子”

之实的尴尬身份,留给文本更深层的延伸思考:一是没能通过科举进阶仕途的孔乙己并没能为自己获取社会生存空间,甚至都没有获得与地位对等的小伙伴平等的对话权。“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7]561}当然,读书人独有的精神坚守和社会意识让其不愿融入小伙伴所属群体,因此,他没有跨入店内和其他穿长袍的人坐下喝酒,“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7]561}。融入掌握话语权的政治空间,不愿是其表,不能才为其实。二是孔乙己身为读书人也没能和丁举人等代表的封建乡绅阶层融为一体,二者只是在“偷”和“打”的过程中才产生联系。融入乡绅阶层文化空间,孔乙己愿却不能。无论是主动远离政治空间,还是被动疏远权力空间,都是“道”与“势”博弈与抗衡的结果。孔乙己的困窘生存状态也折射出20世纪初期家族势力和阶层分级对于知识分子发展空间的局限和制约。“我从他(四叔)俨然的脸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扰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9]648}身为知识分子的“我”,对于鲁四老爷为代表的乡绅阶层营造出的俗文化氛围“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4]。此时,“我”在身份认同上将自己与祥林嫂视为同类,对鲁四老爷代表的乡绅阶层无比恐惧且无所适从。“我”在仓皇中逃离“故乡”,“我”对鲁四老爷威严的远离,“他”对“我”离去的默认或无视,正是知识分子折服于乡绅阶层的文本注释。

正如余英时所言,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道’反抗‘势’,又被‘势’排斥的悲剧。”^[15]中国知识分子尊崇的价值信念是儒家的道德传统,其希望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担当起民族的责任和重任。因此,脚踏实地地实现儒家的思想理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儒家的“道统”也成为其与权力“政统”抗衡的法宝和利器。但从历史上看,抗衡皆为徒劳,“道尊于势”的道德传统也只是一种理想。其一,源于宗法社会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以“入仕”作为其唯一的前途和出路,个体依附政治而生存,一旦其所依附的政体破坏,知识分子就表现出思想意识的惶恐和不知所措。政治之外,缺乏社会立足点,精神依附

的单一性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势”对“道”的约束和控制,知识分子所尊崇的“道统”也就暴露出其软弱性。换言之,知识分子所依存的“文化空间”尊崇于政治主体的“权力空间”并试图进入其“话语空间”,然而,“权力空间”却以把控和统治的姿态面对其所属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处于生存被动状态。加之,“文化空间”在“社会空间”立足的局限,使其最终成为“自己手制的偶像”^[16],消亡于“权力空间”的统治中。其二,儒家文化尊崇的“道统”是一种内心的德行文化,源于个体的内心教化而实现道德的教化,它属于个体的文化而非属于集体的文化,它属于内力的教化而非他力的规范。因此,它能成就个体的内心道德教化而难以实现群体的制度化教化,个体的势单力薄始终难与坚不可摧的“势”抗衡,其“话语空间”的有限甚至消亡也就成为必然。孔乙己没能为其自身寻求到思想生存的“文化空间”,或者说,孔乙己没能寻求到和自己同为读书人的沟通有效的“话语空间”,能为其“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的社会处境做一个最佳的注脚,而“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则是“道”消亡于“势”的符号注解^{[7]563}。

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里说,中国历史始终徘徊在这样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7]回归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固有的生活秩序才是其追求的生活方式,任何打破旧有秩序的革新带来的只有恐慌和反抗,这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现实,也是鲁迅置于群体生存空间之外看到的事实。如果说不同身份的个体被放置在彼此独立的空间中,构成不同的群体,群体之间的隔阂为启蒙不可实现的第一重原因,那么,知识分子作为启蒙主体,在统治阶级的话语权威下丧失话语表达权力则为启蒙不可实现的第二重原因。面对寄予了自身狂热启蒙理想的社会现状,鲁迅于五四时期走向启蒙的理性思考,实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必然。

三、“启蒙主体”“启蒙对象”“权力主体”的关联与博弈:《孔乙己》与鲁迅启蒙思想的发展新变

其实,渗透于鲁迅作品中有形或无形的空间

设置，说到底都是鲁迅关于中国社会启蒙现状的隐喻，其表征的是“启蒙主体”“启蒙对象”“权力主体”三者之间的关联与博弈。在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有形的空间位置（如方位和场所等）秩序是与无形的文化身份、价值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能规范人的言行举止，而随着对“启蒙主体”“启蒙对象”“权力主体”三重关系的认知变化，鲁迅的启蒙思想也在经历着走向理性的发展新变。

就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关系而言，空间与时间交错的矛盾在于：文化空间消解于物理空间，“将来”时间消融于“现在”时间。启蒙主体以对启蒙对象实施话语主导和文化霸权为其启蒙职责，启蒙主体试图以其启蒙意旨承载的文化意义付诸启蒙对象，而故事空间的有形秩序在无形中将文化话语主导权消解，将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安置于独立却不平等的物理空间。如此，启蒙主体预设的文化空间被间接摧毁，物理空间暗喻社会结构和文化分层，空间意义就此停滞。随着空间的停滞，“将来”时间也被“现在”时间消融，沉寂于现有的时间秩序中，推进和发展成为徒劳。孔乙己不厌其烦地对“小伙计”进行“茴”字写法的教化，试图以自我标榜和预设的文化优势挽回其在“小伙计”眼中所处的文化劣势，但换来的却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谁要你教”的鄙夷和否定^{[7]561}；“孔乙己，你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7]561}旁人的质疑和嘲讽制造的不平等交流秩序中止了孔乙己的启蒙话语，他在“颓唐不安”中嘴中说出的“之乎者也之类”成为众人嘲笑的内容而非其他。“人们在闲谈之际自以为达到了对谈及的东西的领会，这就加深了封闭。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一切新的诘问和一切分析工作都被束之高阁，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压制延宕下来。”^[18]显然，孔乙己在这场“鸡同鸭讲”的文化对话中彻底败下阵来，其主体地位亦随之退隐或消亡。时间消融于空间，一切归于沉寂。

“鲁迅的思想意识发展是时间性的，是不断做着前进性的运动的，而在他面前的现实世界则是空间性。”^[19]青年时期的鲁迅，由绍兴而南京而日本，求学的经历变化于空间的移动，“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0]312}然而，“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0]313}。鲁迅自我生存物理空间的更换，让其看到了不一样的人与事，进而衍生了其“弃医从文”的救国思想。然而，麻木的国民，其物理生存空间依附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意识，“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启蒙理念，面对如此“万难破毁”的启蒙对象群体时，最终难免消亡在“铁屋子”一般的麻木与冷漠之中。日本留学期间，从意识层面构建的狂热的启蒙激情、期许的启蒙理想，终难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即民众从昏睡入死灭的社会现状。如此，鲁迅的启蒙认知走向了理性阶段。

从启蒙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关系看，空间与时间交错的矛盾在于：文化空间消解于政治空间，时间意识退隐。权力主体以其构建的政治空间辐射出的权力霸权主导空间秩序的现实，其行为机制具有不可言说性和难以对抗性，其以不言自明的威势覆盖其他话语存在方式，彰显主导导向和权力威势。其过于强势和难以扭转的统领地位消解了其他空间形式的同时，让多种时间意识在此间碰壁、消沉甚至退隐，启蒙主体的文化优势与启蒙意识也因此被侵占和淹没。“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7]561}，两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在权力的威势下自动隐身，无法展开。甚至“丁举人”也只是存在于“孔乙己”与“酒客们”之间的一个话语符号，“孔乙己”与“丁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对话沟通，“丁举人”以一种无声的权威存在，潜在地安排着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启蒙主体的主观意识和权力主体的话语统治共存却无共语。换言之，“道”与“势”虽同存并置，两者却无对话的空间。

“‘人在空间中’已经不是一个元命题，人不能进入到空间之中去则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21]启蒙主体和权力主体共置的空间范畴中，两者的或互斥或不相融产生了空间的相隔或相离。其一，权力主体的话语权威衍生的空间张力拒斥了启蒙主体的话语表达，使二者相离于文化空间。孔乙己自始至终也没有与“长衫主顾”产生主动

的言语对话,他与后者的沟通止于对嘲讽讥笑进行辩驳解脱。其二,启蒙主体未能进入到自我位居的空间行使话语权力。无论是“君子固穷”“者乎”之类的文化表达,还是“茴香豆的茴字”写法的循循善诱,都不过是孔乙己自我的言语表达,其无法改变孔乙己的身份定位,更毋言对他者产生话语引导和进行文化渗透。相隔或相离,都有形地传达着启蒙主体启蒙的壁垒和尴尬。在《孔乙己》的文末附记中,作者以退隐的方式陈述小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并没有别的深意”^{[7]563},其主动隔离当时的文化守旧派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的影射攻击之意图非常明显。如此,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体或主动或被动地推置于权力空间之外,以自解或自隐的方式言说着写作“很拙的小说”的无奈。

透过《孔乙己》文本的空间表达,鲁迅小说的空间意识和启蒙思想鲜明呈现出来了。生活于中国文化空间中的鲁迅,试图打破表层时间意义上的时间秩序,将民族的时间顺序跳跃至西方“现在”的时间状态。这势必要求其在“现在民族空间”中构建一个承载西方文化与精神的“西方空间”,达至其理想状态上“时间”与“空间”的时空统一,启蒙即为其设置的理想实现途径。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无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2]这里强调的是,主体的主动思辨能力为启蒙产生的要旨。源于西方、生成于中国语境的五四启蒙运动之为有效,必须依赖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启蒙主体自身的觉悟意识与行动能力;二是启蒙对象的可启蒙性。启蒙主体通过启蒙话语的表达渗透至启蒙对象而使其觉醒或行动方为有效启蒙,反之,启蒙对象的无意接受或有意反抗导致启蒙行为成为单向行为则为无效启蒙。同时,启蒙主体自身的混沌不确定性阻隔启蒙意识的表达亦意味着启蒙行为的未发生。启蒙主体受控于权力主体的话语消隐,启蒙主体消解于启蒙对象的话语回避,都在无声地言说着启蒙主体本身的不自信与不坚定。如果自

我启蒙尚未完成,其自然难以担当他者启蒙的重任。同时,启蒙对象的麻木与无意识也让启蒙行为成为无矢之箭,缺失方向和目标。如此,启蒙行为自动消解。“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20]314}鲁迅也终于认识到,通过启蒙实现“时空统一”的空间秩序终究只是一种理想。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23]细查鲁迅1917年到1922年的创作,主要有《热风》(杂文集)和《呐喊》(小说集),其占鲁迅著述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与五四时期狂热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对照的是鲁迅异乎寻常的沉默与冷静。对此,鲁迅如此解释:“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么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多。”^[24]“失望”“颓唐”只是作者委婉的自谦之说,清醒与理性才是他此时思想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与他留日时期创作的积极和思想的活跃(以日本期间创作的文言论文为证)情况相反。如果说,留日期间的鲁迅还保有“个体”能对“群体”进行感化和产生影响的期待,那么,此时的鲁迅已经真实认识到“群体”对“个体”的排斥和疏离。1920年,鲁迅在写给青年学生的回信中曾这样建议:“仆以为一无根底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是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25]在激情喷发的五四时代,鲁迅对于青年学生提出“苦读”而非“空谈”的建议,当是看清现状的鲁迅给予他们的最真诚的建议。

无论是对话的被迫中止,还是沟通的碰壁退隐,鲁迅通过《孔乙己》的空间秩序设置言说的正是自我的启蒙新变:在多群体自建而共存的空间秩序中,多维话语方式以各自张力辐射存在,其并置却不平等,映射出相连且相斥的权力“差异”。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或打破此在空间秩序成为“万难”。“群体”“差异”,启蒙主体的权“势”之控,以及自我局限均为难变之因,而重置空间秩序重设话语体系则成为了鲁迅启蒙思想寻求的新的方向。从绍兴而南京而日本而回国

的人生经历，反映了鲁迅个人成长的空间变换；从置身“铁屋子”之外期许唤醒熟睡的人们到隐身书斋独抄古碑，则昭示了鲁迅作为启蒙主体的身份变换。这两重变换，见证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启蒙思想历程，也开启了鲁迅关于社会、人生的更深层思考。

参考文献：

- [1] 孙伏园. 鲁迅先生二三事[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10.
- [2] 李友益. 孔乙己的空间形式及其历史性误读[J]. 鲁迅研究月刊，1994(1)：26.
- [3] 张中良. 《孔乙己》细读[J]. 鲁迅研究月刊，2016(9)：10.
- [4] 张全之. 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J]. 鲁迅研究月刊，2013(10)：19.
- [5] 丸尾常喜，秦弓. 隔绝与寂寞：孔乙己的后影[J]. 鲁迅研究月刊，1992(10)：45.
- [6] 曹聚仁. 曹聚仁谈鲁迅小说[J]. 鲁迅研究月刊，1994(10)：68.
- [7] 鲁迅. 孔乙己[M]//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8] 冯雷. 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30.
- [9] 鲁迅. 祝福[M]//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10] 赵炎秋. 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1)：3.
- [11] 许纪霖.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12]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M]. 3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9.
- [13] 三民书局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大辞典[M]. 台北：三民书局，1985：4841.
- [14] 鲁迅. 坟·写在《坟》后面[M]//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83.
- [15]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91.
- [16] 鲁迅. 故乡[M]//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70.
- [17] 鲁迅. 灯下漫笔[M]//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13.
- [1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庆，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48.
- [19] 王富仁. 时间·空间·人（四）：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 鲁迅研究月刊，2000(4)：14.
- [20] 鲁迅. 《呐喊》自序[M]//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21] 王富仁. 时间·空间·人（二）：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 鲁迅研究月刊，2000(2)：14.
- [22] 康德. 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M]// 詹姆斯·斯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徐向东，卢华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1.
- [23] 鲁迅. 热风·题记[M]//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81.
- [24] 鲁迅. 自选集·自序[M]//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818.
- [25] 鲁迅. 致宋崇义[M]//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1.

责任编辑：黄声波